

我市艺术家创作战“疫”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晨文/图）为更好地弘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增强社会各界战胜疫情的信心与斗志，自2月1日起，市美术馆向全市艺术家发出“抗击疫情、我们同在——周口市美术馆在行动”活动倡议，截至目前共有320名书画家参与其中，创作作品400余件。

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无数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地站在抗疫最前沿。周口艺术家用作品展现了医护工作者主动请缨、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的无畏与坚守。他们将主题选择在基层，通过艺术形式表达了对抗疫工作者的支持与赞扬。书



泥塑作品

周口老城商脉考

董建军



周口，一座因水而生、因商而荣的城市，“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熊廷弼《过周家口》）描述了他昔日的繁华，“又沿大沙河之左岸，至周家口，此一大商业市镇也”（孙中山《建国方略》）传递出他曾经的影响，在素以农见长的传统平原农区，周口中心城市自形成之日起，就带上了深深的漕运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印记，书写着商旅奔驰通江达海的时代传奇。

一条河，两个集
颍岐口，接千里
三川汇，成化始
千帆集，逐波兴
百条街，十会馆
讲诚信，义利行
老字号，意隽永
阑珊处，新芽萌
老城厢上流光影
新时代里看复兴
一一是为序。

一条河，两个集

一条河即是沙颍河。沙颍河周口段在元代以前并未向东流，而是经周口新街口处折而向南又向东南流。据清朝大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元代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北汝水（又名沙河）经溵水由孙嘴口入颍，颍水不足以容乃开新河，所谓新河，就是周口至槐店的沙河。之后，颍水故道淤塞乃至被填，新河“转正”，名为沙颍河，实质上是周口以下颍水改道的一条人工河流。明朝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沙颍河北岸西老寨形成墟集（双日集），东西五里，南北两里，置永宁地方，设乡里，分属商水县和陈州管辖。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沙颍河南岸子午街（今老街）设贸易市场子午集（单日集），与永宁集隔河相望。山西周姓移民在子午街北口开辟渡口，摆渡往来客商，称为周家渡口、周家埠口，周口由此得名。

颍岐口，接千里

据专家考证，颍岐口在今周口港区李埠口乡高山顶处（参见周建山《颍岐口地望考》）。明朝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采纳户部尚书都新的建议，开凿中原原水，将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从淮安起运，经淮河、沙河到达陈州的颍岐口跌破坡下，换小船运至跌破坡上，另以大船载入黄河，至新乡八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远赴卫河，转输北京。又据查证其疆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经颍岐口转运的一段很重要的衔接线路是走沙水（又称蔡水、小黄河）。于陈州境内的河线是：颍岐口（牛家口）、许家湾、指挥营、柳林集。也正是当地群众广为流传的老运粮河（参见乾隆《淮宁县志·河渠图》、刘占国《历史上周口运河的流向及航向》）。

三川汇，成化始

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黄河在开封北面的仪塘湾决口，汴、蔡河水相继淤塞，江淮漕路断绝。为了开通漕路并宣泄淤水，工程尚书贾鲁主持

疏通汴河、蔡河，挽黄河向东南流，从今兰考县东流出，经曹县南、商丘北、砀山西、萧县北，至徐州入泗，由泗入淮。也就是说彼时的贾鲁河并不通过周口。明正统年间，（黄）河决荥泽孙家渡。孙家渡河经朱仙镇至白家潭，进入扶沟县境。明成化中，知县李增“自吕家潭南张单口另疏新河，逶迤西南至东北五里许许会桥，与双泊合流出境，绕西华三面，下至周家口入沙河，下达淮安”。“贾鲁河明成化年间始通周口”由此而来。弘治年间，都御史刘大夏等人再从孙家渡引黄河水东南流，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商水县汇颍水，称为贾鲁河。其实这条河并非贾鲁所开。但在此前，贾鲁曾主持疏浚过汴、蔡等河流，故后人统称为贾鲁河。

千帆集，逐波兴

贾鲁河道的疏浚使其恢复了水运功能，三川汇流，溯贾鲁河北上，可达朱仙镇，连通开封府，进而通达北京及北方各地。沿贾鲁河南下，向东南可达于江浙，向南可直达于汉口。向西可沿沙颍河至豫西、陕南。周围百余里的商贩亦多迁入，沿河三岸鼎足之势形成。明万历年间，航运又有发展，埠口逐渐增多，一些商贾大户开设粮食、杂货、茶麻、中药等商铺，商业贸易日渐繁荣，城市日渐兴旺，商贾云集，施墙密布，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当时的大学士熊廷弼《过周家口》形象题诗（全诗待考）也成为了传诵至今的佳话。

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山商人黄汴所著商书《一统路程图记》，辑录了当时全国主要商道的水陆交通路引，其中三条路引中有周家口的名字，这是目前所见周家口这个地名最早见于书籍的记载。三条路引分别是“颍州由前河至汴城水路”“颍州至襄城县、钧州水陆路”“淮安由南河至汴水水路”。明天启六年（1626年）程春宇所著《土商类要》也是一部重要的商书，其中“清江浦（今淮安）由南河至汴水水路”路引中记载了从淮安经周家口至禹州的水路行程，并提供了沙河上游的水路行程。由此可见，当时豫省境内以周口为中心，连接东西、贯通南北、辐射大半个中国的漕运和商运交通网络已然形成（参见岳雷《周家口水运检索》）。

百条街，十会馆

漕运的发达使周家口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清顺治年间，沿沙颍河先后开辟了大渡口、小渡口、上下齐埠口、新渡口，在沙颍河贾鲁河交汇处铸立镇水铁牛。到了康熙初年，商水县设置24地方，永宁集位其地方之一，以后又新添了周家口。康熙九年陈州管粮州判治所由淮阳移至周家口，以统管全镇市面。雍正十二年升陈州为府，并添设粮捕水利通判驻扎周家口，周家口商务随之臻于鼎盛时期。清乾隆十二年的《商水县志》记载，周家口“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再往销往周边各地。周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西货的商店，如洋布庄、自

行车行、西药房等。商业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出现了商会、同业公会等近代商业组织。同时，一些近代服务业如照相馆、理发店、修表铺、菜馆、旅店等也纷纷出现。周家口金融业得到了充分发展，钱铺、钱庄、银号等传统银行和近代银行并存（传统银行主要集中在周口老街、近代银行主要集中在周口新街），并逐步向近代银行过渡，周家口发展成为“工商并茂的都市型大镇”。汽车公路修筑，近代邮电兴起，创设了电报局，开办了国际邮政，设立了德化街邮信局、磨盘街邮信局等（参见杨光《近代周家口镇经济转型研究》）。

讲诚信，义利行

三川交汇，三鱼共首，使周口成为投资经商的风水宝地。全国各地的行业巨贾纷纷来周口投资兴业，较多的有山陕帮商人、怀庆帮商人、安徽帮商人和两湖帮商人等。他们在周口苦心经营、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发家致富，为周家口的繁荣昌盛及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自己融入周口进而成为周口的一份子。

周口关帝庙（山陕会馆）是周口诚信文化和义利观的集中体现。“秉烛持纲常顾影何惭心上日，封金完节义对人不愧性中天”，这是周口关帝庙春秋阁前的一副楹联。周口关帝庙，这座曾经的山陕会馆，耗资巨大，历时159年建成，不仅印证了周口昔日商业的繁华，也是周口商业文化之魂的集中体现。对忠义公的无限敬仰寄托了植根周口的商人们的不懈精神追求和道德信仰，声震灵霄，唱响诚信周口，“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贯穿于商人们的经营与管理之中，成为商家极力打造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周口的商业文化之魂。这一点在日常杂货交易中使用的“天、地、人、心”四种秤上也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

老字号，意隽永

周家口商业最繁华时期的常住人口加上流动客商等人口急增至近20万人，商人商号达1500家~2000家，年经营规模估算为500万两~600万两白银。据周口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其碑阴镌有的捐资抽厘的行商号就有320家，分属杂货、麻、油、丝、布、米、果、山货、骡行、皮行、药材行等。这些老商号不仅勤于经营，而且字号典雅、意味隽永，比如新盛源、龙兴岐、瑞龙西、交泰东、王盛和、乾顺公、世发康、生生茂等，不一而论。既寄托了商帮、商人祈生意兴隆、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又传递出传统文化特有的气质和神韵，伴随着周家口名扬天下。

阑珊处，新芽萌

清朝中后期，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1843年，黄河在中牟决口，致使贾鲁河淤积，贾鲁河北上开封的航道被阻，自此再未恢复。周家口的商业开始走向萧条。咸丰同治年间，周口迭遭战乱，著名的山陕会馆“三次焚毁，几至于尽”。周口以西数十公里的漯河，因地处铁路沿线而吸引了大量商民，周口则“连年生意冷落”，商业渐趋式微。

尽管如此，老周家口的影响仍在，而且逐步向近代经济转型。手工业逐渐从家庭作坊式转变为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或工厂。近代商业和服务业渐露端倪，商品的种类除传统的本国商品外，还有了洋灯、洋火、钟表、肥皂、煤油、石油等一些舶来品。大量的农副产品的经营和销售，则由通商口岸运至周口，再销往周边各地。周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西货的商店，如洋布庄、自

三、帝心难测，太昊祠畔陨星斗

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植羽翼虽被剪除，但由于其威望甚高，兄长至死未放下对曹植的戒惧之心，就连东征归来，亦是意绕道雍丘，驾临曹植处所，仔细相验，以安心结。而继位的新君侄儿萧何随曹植，同样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特别是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发生的讹言“新君卒、群臣欲迎立曹植”之事，让曹植的处境更加不妙。《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是时伪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太后群公皆惧。及帝还，皆私查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流言猎猎，曹植危如累卵。新帝虽对此事暂不究问，但也难免不把他看作是危险之源而大加防范，“急煎”变“缓煎”，曹植又被徙封浚仪，次年才得以复还雍丘。

然而，在其命悬一线之时，素负“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志向的曹植，雄视天下，甚为曹氏政权能否长久百年而忧思难眠；帝王“孤天下”，禁锢同姓诸侯而重用异姓大臣，遗患无穷！每虑至此，其作为新君的唯一嫡亲皇叔，忧心忡忡。为大魏王朝，曹植一改昔日尽力韬晦、以期自保的哀悯心态，毅然祈望新政初立、建功效效，遂上《求自试表》，慷慨陈言：“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冀望新君能舍得一个职位，使自己抱利器而有所施，为大魏建功、为王朝兴业。其心诚志坚，言辞激切，气势磅礴，足以感天憾地。然而，曹植的一腔热血，却仅是一厢情愿。上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唯一改变的是，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被徙封东阿，又要启程上路了。同时，当政者对藩国的限制和圈禁进一步加剧，曹植境遇尤甚：

时法制，待藩国即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曹植传》）

封地频更，作为新君的唯一嫡亲皇叔，曹植捍卫大魏王朝的责任丝毫不曾懈怠，其“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的梦想与忧虑，再度被激发，企图建功立业，匡时济世。其持续“任性而行”义在前，虽千万人吾往矣！”曹植再次上表，方式已经转变。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植又上《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以称扬天地之德为始，接着盛赞“唐虞钦明之德”，颂美“文王翼之仁”，阐明皇帝与诸王之间应有的“骨肉之恩”及“亲亲之义”，而后笔锋一转，窃望抱利器而有所施，言辞更加急切：

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历经曹氏三朝的砥砺，曹植对朝野权术有着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他以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隐约地感知大魏王朝的隐患所在。特别是想起父王晚年病重之时，“夜梦三马同槽而食”，其隐忧愈重，彻夜难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愈加令其焦虑。然而，身处绝境的曹植，曾饱受“兔臭”“豺狼”和“苍蝇”之害，还有那虎视眈眈的“监国谒者”，都时时令其有夺命之虞，对朝中大臣又岂敢再有指点之妄？引火烧身，曹植畏惧，惟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而冀望执政者有所警醒：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安之、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陈审举表》）

站在曹氏一脉的角度，曹植对“豪右执政”、“异姓”“当权”之事，可以说，有着极其犀利的谋略远见。（此后未过几年，曹魏王朝即为异姓所替代，他的焦虑与隐忧不幸言中）为规避隐患，曹植在上表中以死忠自荐：

常愿得一奉朝覲，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曹植《陈审举表》）

为“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曹植知难而上，愿披坚执锐，“一奉朝覲”“死不恨矣”。但可惜的是，大魏帝王历来关注的只是“公族之臣”有无觊觎之心，而对王朝图景向来自视甚高。因此，曹植的隐忧和牵挂，丝毫未引起主政者的侧目，仅仅获得“优答报文”，抚慰而已，其依旧是“圈牢之养物”。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曹植被封为陈王。（陈，即陈国，周朝封为陈国，秦置陈郡。古人称水北为阳，因陈地在淮水之北，西汉改陈郡为淮阳）履任伊始，依照惯例，曹植分别作《改封陈王谢恩章》《谢妻改封表》感谢帝恩。但是，此时的曹植每况愈下，早已没有了昔日雄姿英发的豪爽，其面黄肌瘦，身体孱弱，就连新君见了也甚为震惊：“王颜色瘦弱何意邪……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曹睿《与陈王植手诏》）新君关切，曹植自然作表致谢：“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曹植《答诏表》）不久，新君女儿亡故，曹植又应新君《诏陈王植》书，相继作《答诏示平原公主诔表》《平原懿公主诔表》。叔侄诏表往来，似是天气转暖、亲近相加，曹植渴求试用的初心再次被激发。时年九月，俯瞰国事，心意忧愁，曹植作《谏辽东表》，假以时谋，献计献策：

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福滋，劝农桑。三者既备，然后令伊管之臣得施其术，孙吴之将得奋其力。若此……曾何忧于二敌，何惧于公孙乎！今不辨于邦畿之内，而劳神于蛮貊之域，窃为陛下不取也。

同时，曹植积极游说，希望面君。然而，他误判形势，满腔的热忱再次跌落谷底：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曹植传》）

郁郁寡欢的曹植，杖藜扶轼，踏勘神农圣道，观瞻“五谷台”。曹植拾阶而上，依礼参拜，缅怀神农圣德，写下诗篇《神农赞》：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
造为耒耜，导民播谷。
正为雅琴，以畅风俗。

循迹羲皇故都，来到太昊祠堂。曹植追忆羲皇圣迹，仰慕不禁，出得殿来，默然肃立，诵下先皇创世的礼赞《伏羲赞》：

木德风姓，八卦创业。

龙瑞官名，法地象天。

包厨祭祀，罟罔渔畋。

琴瑟以象，时神通玄。

缅怀先祖，遥望京都，曹植“怅然绝望”，骥足不展，遗恨何极！每天汲汲无欢，“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资治通鉴第七十二卷》）这种极度绝望的凄凉心境，凝结成文字，在其晚年的《释愁文》中一显而现，字字泣血，句句忧心：

子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焚。有玄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愁之为物，推惚推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捉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也难进，其去也易追。临餐食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饰不泽，饮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四十一岁的曹植奄然归天。是夜，一颗赤色大星光芒显曜，自西北流于东南方向，坠入太昊祠畔。

然而，曹植虽死，但他那位新君侄儿对皇叔的猜忌依旧没有放下，谥之曰“思”，要其在天之灵继续“追悔前过”。曹植走了，惊吓过度的家人，并未因曹植的离去而消除对当朝执政者的恐惧和隐忧，更担心当政者会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于陈州城四门出殡，在城南三里立为冢，后人称之为“思陵冢”。惶恐未定，不久又取其棺椁振荡安布，“东阿鱼山”成为其疑冢之一。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思陵荒冢远离魏都，既无大型殉葬又无皇封，荒树枯木，蓬蒿满眼。明代诗人戴昕